

黄乃裳和他创办的《福报》

林 其 铤

黄乃裳是积极参与戊戌维新变法活动，以后又积极组织海外移民开辟砂撈越“新福州”，最终追随孙中山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曾经在国内、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黄乃裳于1896年4月在福州创办的《福报》，是专事鼓吹维新变法的报纸，也是福建第一张近代报纸。但是，黄乃裳的事迹和他创办的《福报》，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从现有出版的关于研究戊戌变法运动的专著和资料汇编、索引中，几乎全没提及。在有关新闻业史和出版业史的专著和资料中，除了在198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家禄等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及其所附《中国新闻业史大事年表》简略提及之外，其他也都付诸阙如。为此，本文拟对黄乃裳和他创办的《福报》作一简略介绍，以便有关的同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黄乃裳，字绂丞，又字玖美，福建闽清六都湖峰人。生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六月，卒於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的家世，据他晚年的自传《绂丞七十自叙》云：“累世业农，父为木工，母林氏，举裳与妹一及三弟。少时半耕半读”。^①

黄乃裳少年时期是在闭塞的山村度过的。1866年，即他十七岁

那年，外国传教士薛承恩等到闽清传布基督教，黄乃裳受洗，次年获“劝士”执照，随外国传教士学习传道，开始学习西文和西方文化，同时也“励志学习八股文”。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前，他先后在福州以及闽江上游古田、尤溪、沙县、顺昌、洋口、延平（今南平）等地传道，在此期间，还从事翻译和创办新式学校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事迹有：光绪元年（1875年）作文劝人种牛痘，并与保灵牧师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五篇；光绪二年（1876年），在福州倡建福音、培元、英华书院；光绪四年（1878年），帮助外国传教士薛承恩等翻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为斯理传》、《丁大理传》、《美国史略》等书。此外，也翻译和编辑了一些宗教书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的惨败，对于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震动。黄乃裳的三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在此次海战中同邓世昌一起以身殉国，这对于黄乃裳的思想更有直接的刺激，从而促使他投身於救亡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他在《自叙》中说：“逾岁甲午，年四十六，三弟乃模战倭於大东沟，以致远大战舰之副管驾与正管驾邓世昌同殉国……回想自三十岁至四十七岁（1885~1895年），十余年之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有所効力于国家，极端偏于彼方，而于宗教，俨成为《默示录》第三章十五节所云：‘不冷不暖之态度。’”显然，政治热情已远远超过宗教的热情了。为了効力于国家，他于1894年参加科举，“以三十名捷于乡”，同他的长子景岱同补弟子员。他此时“废然弃八股，肆力读书”，政治视野大为扩展。1896年4月，他在福州创办了福建第一张近代报纸《福报》，同北方的维新派遥相呼应，专事鼓吹维新变法。1897年，应宗师王季樵（锡蕃）经济特科之荐，挈长子景岱入京会试，被选为拔贡，恰好遇上光绪帝下令变法，遂留京积极参加变法活动。他晚

年的《自叙》对此有一段概述：

“会德宗愤外力之侵袭，内政之腐败，毅然以变法振兴中国，适康有为等六君子在京辅佐之。戊戌五月以后，按日下维新谕旨一道，举国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而余亦以为时会可乘，逗留京华八阅月，曾八上书，其已批发，谨《请行简字》一摺……此外有三摺，已批行而未发；并有请旨准基督教与儒教并行不悖者。其时日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谒李文忠（讳鸿章）者六，文座主者六，与王宗师及美国丁韪良、刘海澜二先生相过从，以讨论变法维新事，兴会淋漓，满望中国之衰弱，得贤君以振兴之。詎八月初八，西后垂帘之诏又下矣。初九，六君子被逮，十三，同受戮于柴市。呜呼！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风。回想居京华八阅月，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州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溺也……八月二十四晨出京，夕到津沽，友人自京遣专足来，促即夕登轮，谓上书二百余人案交杨次山究办，君名在第十三云云。”

从这段自叙可以看到：黄乃裳在京八个月期间，不仅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开始、高潮和失败的全过程，而且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所以他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黄乃裳从天津乘英轮抵上海，会晤了李提摩太、李思、艾约瑟等人，旋即归闽。为少“纾利他主义”，“且以远女主之淫威，与夫专制之虐毒，”他想另辟蹊径，通过有组织的海外移民，为家乡穷苦同胞创一“谋生之乐土”。1899年9月，黄乃裳挈眷出国，至新加坡，以办报馆着手，同时遍行英荷各属地觅找垦地。1900年在砂撈越拉让江诗巫附近，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了比较理想的可开垦荒地。於是赴古晋，通过华侨王长水的介绍，与砂撈越国王查尔士·布律克二世按照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完

全平等的原则签订农垦条约十七条，为海外垦殖作了准备。

1901~1902年，黄乃裳两次回国，在福建闽侯、闽清、永泰、古田、屏南、福清等县，先后招得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医师、传教士在内共计一千另七十二人到达垦场，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历尽艰辛，终于垦辟成功。1901年砂撈越政府办的《砂撈越宪报》称诗巫为“新福州”。以后新福州垦场人口激增，1925年，福州人估计约有八千人。及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诗巫福州公会举行“新福州垦场六十周年纪会”大会时，砂撈越之福州人已达七万有余。1977年估计福州人约近十万人。新福州垦殖的成功，深受当地政府的赞扬。黄乃裳组织的海外移民，就垦殖事业说是成功的，因而他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缅怀和尊敬，被尊称为“新福州港主”，至今受到纪念；并将他在1901年1月9日率第一批垦民到达诗巫船舶的地方，改名为“黄师来”。1958年诗巫市议会将一条新街命名为“乃裳路”。

黄乃裳领导组织海外移民垦殖，其志本在“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创“可资数百万人为谋生之乐土”。可是，要想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属地里创立他的理想“乐土”，自然也带“乌托邦”的空想性质。所以，他的垦辟成功，虽然堪称“华侨精神的典型”，“国际间的奇观”^②，但就其社会理想来说，仍然是落空了的。最后，他因无力偿还农垦债务，只得请求沙王，“以农人所欠四万余之款，抵还借项，而以垦场一切之事，托诸美国教士富君，照章办理。”^③自己便于1904年6月，挈眷取道星州，回到祖国，抵达上海。

黄乃裳在戊戌变法失败时，眼见六君子被杀，清廷腐败，即萌“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溺”的思想。1900年6月，黄乃裳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先生，并晤谈数次。孙中山得悉《美国史略》为其手译，“因离座为揖，遂相与订交。”通过此次同孙中山的直接会晤，黄乃裳参加革命的意志益坚。他回到上海，即“谒蔡

元培、谢由己、陈其美、马湘伯、林森、汤尔和、蔡怡宜诸君，及苏、沪、申、神州、民吁各报主笔与湘、皖、鄂名流数十辈，讨论民党宜如何着手。”以后，他或者托言办学、或者假借办报、举办实业之名，来往于福建各地及新加坡，鼓吹革命，为国事奔走。1911年他出任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同年11月8日，为从事光复闽省，指授李藩编三书院学生为炸弹队。11月9日，闽省光复，当日黎明，他亲自“举彩制十八星红方大纛，由桥南机关部率体育会百余，南台商团百余，文士三十余，合三百余人入城市，行十余里，观者填衢塞巷，望见旗影，莫不欣欣然欢呼鼓掌，谓吾汉族之河山，今夺回於满人掌握矣。”福州光复后，临时参议会成立，他出任交通司长；当时由于财政困难，他以个人名义电南洋各埠华侨请助。12月政务院议设筹饷局，他出任筹饷局总办。袁世凯窃国，他愤而辞职，接着被诬入狱，后因“侨情甚愤”，又经多方营救才获释。张勋复辟，他又为国事奔走。1920年，孙中山先生为军政府大元帅；10月，黄乃裳以七十二岁的高龄被召赴广州任元帅府高等顾问。1921年3月，因病回闽休养。1922年2月，萨镇冰任福建省省长，他又出任福建省公署高等顾问。1924年7月，因肝病回故里，9月22日病逝于闽清县寓所，终年七十六岁。他一生为福建家乡人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所以至今还为家乡人民所怀念

总之，黄乃裳的一生经历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献身精神投身于祖国“救亡拯溺”的运动，他的思想和实践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创造了许多不朽的业绩，至今仍为海内外同胞所怀念。所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有影响而值得重视的人物。近年来，已有人从华侨史的角度对他进行了研究，但同海外学人的研究比较起来，应该承认还是有不小差距的；至於从近代史（比如戊戌变法运动史）的角度加以研究，那就更加不足了。

二

据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他一生前后六次办报。共创办以下六种报纸：《邹山使月报》、《福报》、《星洲星报》、《左海公道报》、《福建日日新闻》（后改名《福建日报》）、《伸报》。《邹山使月报》於1873年在福州创办，属基督教报纸，仅编辑数十册。《星洲星报》於1899年创办於新加坡。《福建日日新闻》於1905年在厦门创办。《伸报》於1916年在福州创办。《左海公道报》创办的时间、地点不详。

《福报》创刊於1896年4月28日，地点在福州，是福建第一张近代报纸。该报两日出版一期（“期”称“次”），每期四开两张，每期登一篇论文。现在已经发现的《福报》有五十五期，始於第一期迄於第八十期，其中缺二十五期。第一期报头有如下记载：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月十六日第一次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八号 福州美华书局印发

本报每礼拜拜二、拜五印出二次，全年计一百张，报资洋银一元五角。

第八十期的时间是1897年1月29日。《福报》是否仅出八十期即停办？根据前引《绂丞自叙》记载：“……至《福报》，则独立办理，刊发二年余，亏蚀二千八百余金”推断，《福报》出版期数当在二百期以上。从现存的五十五期《福报》情况看，只有三篇外稿明确署明：“林秋年稿”、“施景琛”、“醒庵居士来稿”，其余文章均不署名，可能均出于黄乃裳自己手笔。

从现存的《福报》刊载的五十五篇文章看，其基本内容全是鼓吹变法维新的，所以说它是一份维新派报纸是切合实际的。在第一期《福州宜设报馆说上》和第二期《福州宜设报馆说下》两篇带宣言性的文章，曾明确地指出：“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

广设报馆之力也……为今之计，唯地无分南北，多设报馆，交相易观，事属新闻，理堪互证。”“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朝廷立政，须先容此直言正气之人，聪明方属不壅。”办报的宗旨很明确，就是开风气，广见闻，立直言正气，加速变通，益强国势。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现存《福报》文章的基本内容加以归纳，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抨击顽固派，积极鼓吹变法。

第六期《醒固篇》指出：“今之士大夫纵论天下大事者辄曰：‘国体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国之道至空洞而无用也。’峨其冠，规其行，若道统悉系於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达时务，能明中国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则斥之为秦桧，小则斥之为扣马、书马矣。……不知此胶柱之见也。古者野处穴居，而既有栋宇以后，论复古者其还以野穴为是乎？”他主张“不泥古法”，

“将参以泰西而自出新意以驾泰西之上。”他说：“盖能变古者即所以善于学古，大泥古者万不能治今。”他鲜明地反诘：“大敌四周，眈眈窥我，朝廷忧劳已极；而士大夫日在高厚之内，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统自任而耻言变法。夫不知而不变犹曰性使然也；若既已知而固执己见不肯降心以求实用，以冀国家之强盛，何也？”

在十五期《抑尊所以达情说》中说：“总之中制，官之自视太尊，不肯一日亲民。”因此，“今惟全删旧例，断狱专决以情则吏无权矣。盖达情莫先于抑尊，屏其左右，有讼即行面问，又须广纳人言，而后断之以理，则狱未有不明。”

在三十六期《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中明确宣称：“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变法也。”“今地球以内无国不言格致，而吾独守王荆公所创之制艺，以为先王微言绝学全在是焉，薄格致为夷人之学。……呜呼！孰有如

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为切于时用乎！”

在三、四期《原才篇上》、《原才篇下》中主张：“多设科目，多开学堂，学某事者即由某事而入仕，学某艺者即由某艺而入得官，但设专责之司，不予兼综之任。”这样“庶几某司有某司应取之才”，“不至举非所用，用非所习矣。”并主张“借才”，援“楚材可以晋用”的古例，“广取西国之才，以教中国聪慧之士。”

在四十四期《崇变说》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政治制度，立上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然则变制将如何？曰：上议院立，则朝之贵臣无敢泄沓以塞天听，则朝政一变矣；下院立，则外省上逮节帅下及版尹，无敢隐匿蔽竅不恤民艰，则外政又一变矣。”

二、肯定实行开放、学习西方的方向，但指出必须革弊布新，务求其实。

在三十五期《中国积弱之势不由于开口通商说》指出：“天下之大势，犹人之肢体也：元气盛则肢体壮旺，虽有风邪暑湿何从而入？元气衰则不特支体疲惫，而口耳毛窍邪皆可乘。”他认为：当时国势之弱不在开放，相反的是由于：“内有奸欺之有司，外无捍御之兵力，而复居于赅赅日盛诸大国之下而曰闭关塞口勿许通商。”他分析道：“夫海口不通，铁甲之船能通之；旱路不通，毛瑟之枪能通之。”是想关也关不住，想塞也塞不了的。所以他鲜明地提出：“谋国之道当谋其方来者，不当咎其以往者；以往之事则为鉴，则以往之误正可防其将来。今不於其方来者图变制，图兴利，图练兵、图恢复海军，但泄泄沓沓，事外之人则好议变通者为异端。……要之：知自强，虽通商千百国均属无妨；不讲自强，即闭关塞口禁不与通，而欧西各国合力来攻，我之海口百道岐出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如何能避能塞？”

在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期《船政刍议》上、中、

下及续议中，比较系统、客观地分析了洋务运动之利弊，探讨了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大胆地肯定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方向，指出不能“因噎废食”，予以全盘否定；但是也揭露和批判了洋务运动中的积弊，指出必须革弊布新，学习西方应该事事“务求其实。”他说：“今天下之筹海防者，无不以船政为病也；其意殆谓甲申之战马江，甲午之战朝鲜，中国之船一覆于法，一覆于日，几无噍类矣……於是视造船为赘谈，视船局为泛设；不谙洋务者至矢口便攻船政以为无用。”针对这种片面观点，他指出：

“不专力以求精，乃一味而议拗，此所谓因噎废食也。”他以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中国“习故者日抱成例，积弱於无形。寻其病源，大要使不知洋务者强参洋务。”出路在于：“贵有复仇之心，存振作之见，拗一切陈旧之套，综成款以练兵；去一切冗散之员，用重禄以选将；辟海内未开之矿，争天下已成之利，专一以造炮与船，如此而仍不强者未之有也。”

在四十五期《论西学务求其实》一文中，集中地总结了三十多年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救弊的办法。他说：“议论多而成功少，纷更多而整顿少，弊莫弊於今日者。自互市以来，天下竟言西学……事事而效之，节节而为之，迺来三十有余年矣，而富强之效茫如捕风，是亦不可以已乎？呜呼，中国之患不患於不为西学，而患于为西学；不患于为西学，而患于为西学犹夫不为西学。何也？夫欧西所谓学者，岂徒以其名哉？……特恐震西学之名不求西学之实，上下相蒙，积习日深，一旦僨事，使人有所藉口耳。为今计者，宜大定其本，改弦更张，事事务以其实而已，一事权宜归划一以责实效也。”当然，他也指出：“凡事草创之始，不能出于百全；苟一见小害，便以为不可行，是因噎废食也。”但是，针对弊端，“急宜严定限制，成就人才，选之必极其精，用之必期其久，功绩可录者重其禄赐，优其职任，而勿易其业，如此实学不出者未之有也；此三者，讲求洋务之大本也。”

应该说，这些言论是很有见地的。

此外，四十三期《借才说》中还抨击了“上自朝廷下及庭下市肆”的用人“四弊”：“有因压制而用者，有因攀援而用者，有因私昵而用者，有因怜悯而用者。”因此，“用者不必皆才，幸而得才仍须缘四者以进而才乃出。”他还主张大胆引进人才，采取“礼意外崇，大权内属”的方针。在七十五期《论出洋采办监造人员宜择廉直有天良者》一文中，指出“出洋采办监造之役，中国之大关键也。”而“善钻营者辄以捷足得之”，这种“善钻营者皆貌为知之，实则一无所知者也；权势之人利其软懦因而发遣；彼欧西之人绝智其诈，洞知中国之习，乃饵监造以小利，用粗冒精，饰羸为良。……（中国监造）唯其不廉而后得赏，得赏而分馈贵人；贵人受之默然不言，有司受之默然不言，趋走之小人受之亦默然不言。”为此，他认为：选派出国采办监造人员，一定要严格挑选那“廉直有天良”和“何者良，何者弗良”“心了了然”熟悉业务和洋情的即德才兼备的人。

三、主张先匡本国之财，发展工商业，养兵卫利与敌人竞利。

第五期《砭愚篇》中说：“何愚乎？愚今之人舍重权以授人，舍重利以授人，无一人能起与敌人抗权，无一人能起与敌人竞利也。”文章认为，西方之强在于：“西国官与商合”，“偶触商艰，则国家之剷除者不遗余力。”而我们则相反：“利在我国尚让人以执其权，设利在彼国更难蹶迹以随其后矣。”为此，他愤慨地诘问当权者：“利之既尽，何以立国？”他主张：“为今日计，且勿冀他国之利，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须捷随其后。何者？无利不足以养兵，亦无兵不足以卫利……盖权得利亦得，权在我则利亦在我。”他批评当轴：“由于大权无握，重利不归，坐听他人之嘬其膏腴，而局内应享者，反袖手以旁观，则愚之甚也。”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期《振兴商务策》上、中、下，以及九至十二期《闽茶论》一、二、三、四等许多文章，对当时发展工商业的现状、积弊、对策，都作了比较中肯的分析，提出的许多议论都颇有见地。认为当时商务面临两个方面的危险：“自马关新约，洋人得入内地设厂所，置机器，则土货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将百倍于今日，可危一也；华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属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难续往，可危者二也。”而当时商务又有“四离”、“五困”的积弊。所谓“四离”，便是：官与商离；商与商离；商与地离；商与工离。所谓“五困”便是：困于吏胥之烦扰；困于华商之倾轧；困于洋商之壅陵；困于工资之繁重；困于转运之艰难。针对面临的形势和困难，他提出振兴商务七策：（1）设专官以理商政；（2）创学校以益商智；（3）定律例以断商狱；（4）谨权量以一商法；（5）造机器以裕商源；（6）给牙贴（按：类似今之专利）以劝商人；（7）开山川以通商道。并认为：“果能行此七策者，则商务既兴不特可保目前一时之利，并可收日后无穷之利；不特可扩中国固有之利，并可夺外国独擅之利。不然者，生齿日繁，利源日竭，虽无敌国外患，亦难长治久安矣。”

在《闽茶论》中，更加具体地分析了闽茶与印度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败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制茶技术落后，由于“专重人工，故条叶粗散，气味虽佳而外观无耀”，在质量上敌不过由机器加工的印度茶。为此，他提出：“为今日计，唯仿照西法为大公司，合众商为之，茶贵少而精，粗装伪茶均禁革不令出口。”

“其费之钜者为大公司，费之微者为小公司，连络一气，有利同享，则售脱可以自主矣。”

总之，《福报》文章都是围绕开放变革，挽回利权，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时代大题目的。所以，这张报纸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作用与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的。

为方便研究者，今录现存《福报》篇目于下，以供参考。

序号	篇 名	期 数	时 间	备注
(1)	《福州宜设报馆说上》	第一次	1896、4、28	
(2)	《福州宜设报馆说下》	第二次	1896、5、1	
(3)	《原才篇上》	第三次	1896、5、5	
(4)	《原才篇下》	第四次	1896、5、8	
(5)	《砭愚篇》	第五次	1896、5、12	
(6)	《醒固篇》	第六次	1896、5、15	
(7)	《哀士篇上》	第七次	1896、5、19	
(8)	《哀士篇下》	第八次	1896、5、22	
(9)	《闽茶论一》	第九次	1896、5、26	
(10)	《闽茶论二》	第十次	1896、5、29	
(11)	《闽茶论三》	第十一次	1896、6、2	
(12)	《闽茶论四》	第十二次	1896、6、5	
(13)	《刺客篇》	第十三次	1896、6、9	
(14)	《叹虎篇》	第十四次	1896、6、12	
(15)	《抑尊以达情说》	第十五次	1896、6、16	
(16)	《去贪污务在增俸说》	第十六次	1896、6、19	
(17)	《禁戢下游械斗议》	第十七次	1896、6、23	
(18)	《续禁戢下游械斗议》	第十八次	1896、6、26	
(19)	《闽中钱法论》	第十九次	1896、6、30	
(20)	《续闽中钱法论》	第二十次	1896、7、3	
(21)	《船政刍议上》	第二十一次	1896、7、7	
(22)	《船政刍议中》	第二十二次	1896、7、10	
(23)	《船政刍议下》	第二十三次	1896、7、14	
(24)	《船政续议》	第二十四次	1896、7、17	
(25)	《论闽浙粤三省通商口岸宜公请律师》	第二十六次	1896、7、24	
(26)	《辟鬼篇上 辟超荐》	第二十七次	1896、7、28	
(27)	《辟鬼篇下 辟淫祠》	第二十九次	1896、8、5	
(28)	《问居民与教民有司应如何措置始能彼此相安》	第三十次	1896、8、8	

(29)	《地谎篇》	第三十一次	1896、8、11	署“林树年稿”
(30)	《地谎续篇》	第三十二次	1896、8、14	
(31)	《论闽省宜设水会》	第三十三次	1896、8、18	
(32)	《孟子以大事小事者乐天者也是全盛得意语不是衰朝支饰语辨》	第三十四次	1896、8、21	
(33)	《中国积弱之势不由于开口通商说》	第三十五次	1896、8、25	
(34)	《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	第三十六次	1896、8、28	
(35)	《书后续前稿》	第三十七次	1896、9、1	
(36)	《闽士宜习官音说》	第三十八次	1896、9、4	
(37)	《处置地棍说》	第三十九次	1896、9、8	
(38)	《仿外洋人头纸式用机器制造钞票流通行用说》	第四十次	1896、9、11	
(39)	《论武科宜急罢》	第四十一次	1896、9、15	署“施景琛”
(40)	《论禁地宜开材木始能充用》	第四十二次	1896、9、18	
(41)	《借才说》	第四十三次	1896、9、22	
(42)	《崇变说》	第四十四次	1896、9、25	
(43)	《论西学务求其实》	第四十五次	1896、9、29	
(44)	《机器织布纺纱宜用中国木棉方可收回利权论》	第四十六次	1896、10、2	
(45)	《振兴商务策上》	第四十七次	1896、10、6	
(46)	《振兴商务策中》	第四十八次	1896、10、9	
(47)	《振兴商务策下》	第四十九次	1896、10、13	
(48)	《论教官宜有津贴》	第五十次	1896、10、16	
(49)	《官隐说》	第五十五次	1896、11、3	署“龔居士庵来稿”
(50)	《论赵高叔孙通之流毒不及于今之欧西诸国》	第五十六次	1896、11、6	
(51)	《论出洋采办监造人员宜择廉直有天良者》	第七十五次	1897、1、12	
(52)	《论国仇在俄而不在日》	第七十六次	1897、1、15	
(53)	《上衡文诸公请去搭截书》	第七十八次	1897、1、22	
(54)	《谈朝鲜李时宇吁请高皇还官疏》	第七十九次	1897、1、26	
(55)	《去资格》	第八十次	1897、1、29	

注：

①《绂丞七十自叙》，此书封面由萨镇冰题签《黄绂丞先生七十自序》，全书计二十八页，书后署：“民国七年（1918）十月初六日也，叙中日月皆主阴历，以便省记云尔。”本文征引除另有他注外，凡无注者皆出此书，为省繁文，文中不一一注出。

②佚名《“华侨精神的典型人物”——黄乃裳开辟新福州》，载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9年版第143页。

③黄乃裳《对于巡警道宪询及新福州垦事因述其颠末》，载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同前引第218页。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羲之年表编后得句（并引）

陶宏景《真诰》注，著录王羲之生卒年云“升平五年亡，年五十九”，依此，当是公元303——361年。另有羊欣（？）《笔阵图》伪文，则定羲之生卒年是公元321——379年。依此则将王羲之“长于谢安十七岁”，变得王小于谢一岁，实属妄诞荒谬之谈。按所有此类《笔阵图》文字，“内容无甚深旨，盖出于后小伪托”（见《辞源》）。卫夫人、王羲之二人的《笔阵图》，《晋书》与两《唐书》全无著录；羊欣《笔阵图》，也不见于《宋书》与《南史》的羊欣本传。宏景《真诰》虽是仙道书，本不足辨，但其行文和注释资料却“斐然可观”，“盖宏景本博学工文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我读陶“注”与羊“图”，并编羲之年表后有感，因赋一绝：

可信萧梁原有“注”，不疑刘宋本无“图”。

知情最是陶宏景，谁赖羊欣鬼画符？

·李长路·
